

第一册

梁启超全集

北京出版社



第一册



梁启超全集

北京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 钢 王相宜
装帧设计：李胜兵
责任印制：传 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全集/(清)梁启超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ISBN 7-200-03703-6

I. 梁… II. 梁… III. 梁启超(1873~1929)-全集 IV. 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7070号

梁启超全集

LIANG QI CHAO QUAN JI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6开本 406.25印张 10660千字

1999年7月第1次版 199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200-03703-6

I·573 定价: 2180.00元

從每方面
繼承
優良文化
不取
精華去其
糟粕

沈鵬題



沈 鵬 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代主席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著名书法家

把中国传统文
化带入二十一世纪

己卯

己卯年抱冲斋主范曾



范 曾 中国文化书苑导师
南开大学教授
著名画家

文華斂萃
寶翰凝光

李铎



李铎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书法家

詩詞瑰寶
文化精華

己卯初夏吳未淳題



吳未淳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教授
著名书法家

《梁启超全集》

编委会名单

顾问：戴逸 张岱年 王道成 朱述新 陶信成

主编：沈鹏 范曾 李铎 吴未淳

主编：张品兴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何宗思	夏小飞	杨良志	杨刚	孙恒年
王相宜	范桥	张嘉翱	徐行	王振海
刘培	唐宗波	李胜兵	吕佩浩	杨利民
曾书民	张岩森	丁京玉	张喆	高筱红

策划：传世

编辑说明

一、本书以林志钧先生 30 年代编辑的《饮冰室合集》为底本，依体裁、内容划分类别，分时论、学术文章、诗论诗话、诗词创作、戏剧小说、碑帖、年谱、游记、书信等部分，以文章（著作）为主，按年代为序，重新编辑而成，以便为社会提供一部内容既完备而又便于检索的梁启超著作。

二、梁启超为我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著作十分丰富，但大多已经编辑出版。这次整理除悉数收录《饮冰室合集》外，还搜集了梁启超的大量书信，分编为社交书信、家书两卷，补入本书。但梁氏书信数量浩大，遗漏仍在所难免。

三、为方便读者阅读，本书将原文的句读，一律改为现在通行的新式标点。由于时间紧，著作数量大，加上编者水平有限，其间错误在所难免，谨请读者见谅。

编者

1999 年 7 月

前 言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一百年以来，常常康梁并称，康就是康有为，梁即梁启超。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由康有为、梁启超两位近代政治家发动的。作为近代改良主义的政治家，梁启超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创办报刊，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他的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唤醒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使他们走上了救国救民之路，他自己也因此而成为杰出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宣传鼓动家，我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人。他一生前后主编、创办和领导的报刊达十七种之多，其中《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国风报》、《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等刊物，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在那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时代，他领导中国舆论界达十余年，那是十分难得的。

当代中国的许多伟人，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都受到过梁启超的影响。郭沫若在他的回忆录《少年时代》中说：“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活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些兴气锐利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兄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代言者。”他甚至说：“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士麦之余，便是崇拜加富尔、加里波的、玛志尼了。”伟人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十分佩服梁启超，对他顶礼膜拜。他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爱不释手，梁启超的文章他读了又读，常常读到可以背出来，对梁的《新民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反复钻研，还加了批语。1936年，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后，在与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公开宣称在青年时代他十分赞赏梁启超，曾向社会呼吁，“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在青年毛泽东的眼里，梁启超的政治追求、理论构架、道德文章都是第一流的。他习惯称“梁

康”，而不称“康梁”。他在一次谈话中称：青年时代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1918年，毛泽东组织学生社团，取名“新民学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民丛报》、《新民说》的深远影响。

梁启超字卓如，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笔名甚多，有衰时客、少年中国之少年、中国之新民、沧江等多种，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祖父梁维清，曾捐为附贡生，太平天国时在乡中组织“保良会”，与农民军对抗。父亲梁宝瑛，一生勤奋，曾长期主持乡政，在当地颇有势力。梁启超就出身于这样一个乡绅地主之家。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能文能诗，是梁启超的启蒙老师。梁启超幼年时最得祖父喜爱，日则教读，夜则随寝。茶坑村地当西江入南海之口，距离宋帝赵昀自沉殉国的厓山约七里。祖父每每与儿孙说起南宋故事，“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这对梁启超爱国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好的影响。梁启超生性聪慧，四五岁开始读书，即习“四书”、“五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好学上进，11岁就考中秀才，17岁中举，真可谓少年得志。在此前两年，他就读于学者阮元创办的广州学海堂，热衷于经、史、子、集，以及词章、训诂之学。18岁时，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年他由父亲陪同，入京会试，落第后归途中经过上海，在书店中购买了《瀛寰志略》，并开始接触西学，开启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从此，梁启超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年秋天，经过同学陈千秋的介绍，拜访了康有为。那时，他少年得志，自以为很有学问。谁知见面一谈，康有为把他下功夫钻研的词章训诂之学，说成是陈腐无用的东西，这对梁启超触动很大，他十分折服康有为，决心从此抛弃旧学，研治新学。第二年，入康有为设教的万木草堂学习。草堂教育“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借公羊“三世说”宣传维新变法，从此他成为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曾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梁启超回忆这一段生活时曾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4年，梁启超旅游京师，恰逢甲午战败，“惋惜时局，时有所吐露”，第二年入京会试，正值清政府割地赔款，激起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愤慨。康有为抓住时机，发起“公车上书”，梁启超四处活动，联合各省举人开会，向光绪帝上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梁启超称这是“清朝二百余年未

有之大举”。

以后，梁启超又和康有为一起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兴办学堂，为即将到来的维新变法作舆论上的准备。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梁启超被推举为书记员。强学会是维新派组织的第一个学会，编印出版了不少书籍，介绍西方文化，还接受康有为的委派，主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该报议论时政，鼓吹变法，梁启超苦心经营，报纸一度发行到三千份。

强学会的活动受到顽固派的弹劾，不久就被查封，《中外纪闻》也随之停刊。1896年4月，梁启超从北京来到上海。8月，同汪康年、黄遵宪创办《时务报》，并担任主笔。《时务报》是当时宣传维新变法影响最大的报纸，以宣传“变法图存”为宗旨，发表了许多批判封建制度、鼓吹变法自强的文章。特别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洋洋数万言的《变法通议》以及《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古议院考》等文章，以进化论的观点来考察历史，说明天地之间没有不变的东西，人类社会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他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针对中国当时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根据“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要求迅速实行变法，以拯救危亡中的祖国，梁启超郑重指出，现在的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像日本那样，通过明治维新走上富强的道路，要么就像当时的波兰和印度那样，招来亡国的惨祸。梁启超驳斥了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见，他指出，“变亦变，不变亦变”，自己主动变法，变法的权力由自己掌握，就可以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如果不主动变法，国家就会被列强所瓜分，后果就不堪设想。

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要求废除摧残人才的科举制度，普遍设立学校，大力培养人才。梁启超在他的文章中，大力提倡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他考察了中国两千年来变化不大，国势愈来愈弱，根本原因在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他依据天赋人权学说，主张人人应有自主之权，一个人为国家尽了义务，就应该享有权利。他主张限制君主的权力，扩大人民的权力，认定压制民权的专制帝王是民贼。如何扩大民众权力，限制君王权力呢？梁启超主张采用“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治国之道。他对“群”作了很多解释，如“国群”就是议院；“商群”就是公司；“士群”就是学会。综上所述，梁启超所说的“群”，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学术机构。为了扩大民权，梁启超主张提高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有知识，有智慧，

才能有权利，愚民是无法享受权利的。而要兴明智，只有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实行变法维新。

在办《时务报》的这段时间里，梁启超不但写了数十篇激昂慷慨、洋溢着爱国之情的文章，还和康有为之弟康广仁集股办了大同书局，出版了一批宣传西方文化的书籍。他编辑了一套《西政丛书》，分史志、官制、工政、农政、商政等部分，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应该多读西方书籍，向西方学习。梁启超在上海，还办了戒缠足会和女学塾，主张去除强迫女子缠足的恶习，提倡男女平等，让女子也学习文化，将维新运动搞得十分活跃。梁启超的这些维新活动，当然要触犯封建顽固势力，为他们所不容。两江总督张之洞通过《时务报》的经理汪康年多方找梁启超的麻烦，梁启超忍无可忍，愤然离开《时务报》，到澳门去创办《知新报》，继续宣传维新变法。

1897年冬天，梁启超来到湖南长沙，担任了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当时，湖南集结了一批略通西法、倾向变法的志士，如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黄遵宪等，他们在湖南筹办新政，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新政已经初具规模，梁启超来到学校后，亲自拟订“学约”，规定了学堂的教育方针是，使学生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变法维新的坚强意志，以便将来成为治理国家的专门人才。在湖南，梁启超参加了湖南改良派的政治团体南学会的各种活动，和谭嗣同等一起创办《湘报》，作为鼓吹维新变法的喉舌。在他们几人的共同努力下，湖南的维新运动搞得有声有色，生气勃勃，这引起了守旧势力的反对，他们攻击梁启超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使学生误入歧途。他们散布流言蜚语，张贴传单诽谤梁启超，迫使他不得不离开湖南。

1898年3月，梁启超再次来到北京。当时，俄国强租旅大，梁启超随同康有为奔走呼吁，力图阻止清政府答应俄国的无理要求，还同麦孟华一起联络数省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请拒俄变法。他积极协助康有为进行维新变法活动，和康有为一起发起和组织保国会，在会中发表了动人的救国演说。他说：“使我国四万万人民者，命知我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竭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救者，吾未之闻也。”他说明保国会的宗旨，就是挽救国家的危亡。顽固派竭力反对这个组织，特地组织了个保国会，指责他们“保中国不保大清”，以此制造混乱，破坏变法。双方斗争十分激烈，官司一直打到光绪皇帝那里。光绪说：“会能保国，

岂不大善！”这场风波才暂时平息了下来。五月间，梁启超又联合应试者百余人，上书请予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梁的建议，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实行新政。6月16日，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之后，又召见了梁启超，赐六品衔，命他专门负责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这使梁启超十分振奋。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极力抵制，虽然变法之诏屡下，而新政之实效极差。9月21日，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并杀害维新志士，重行听政，撤废维新诏令，变法完全失败。康有为于政变前夕出京，得到英人救护，经香港逃往日本，梁启超事先得到通知，也在日本人的救助下逃到了日本。

变法失败了，但梁启超并没有从惨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他把变法失败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小撮顽固派的专制和阻挠，错误地认为只要打倒几个顽固分子，让光绪帝重新执政，维新变法仍然是可以实现的。他说，办事必然会遇到阻力，事愈大阻力也会愈大，但只要努力，一定会冲破阻力达到目的。梁启超没有看到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民主革命派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改良主义道路是不通的，而且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在旅居日本的最初几年里，梁启超愈来愈感到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他认为如果谁再看不到这种亡国的危险，那他就不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了。面对慈禧太后等顽固派把中国弃到割地赔款、国债累累的地步，他痛苦地叹息说：“中国之弱，至今而极矣！”

1898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编辑出版《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的主张，继续宣传改良主义思想。《清议报》的宣传和国内知识界的心态息息相通，博得了许多人的称许。不少青年通过读《清议报》明白了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在客观上，《清议报》的开民智、倡民权的宣传，给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制造了舆论，这是改良主义者梁启超无法想像的。《清议报》是十日刊，出了一百期就停刊了。停刊以后，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称自己是“中国一新民”，他认为，“欲维新吾国”就要先“维新吾民”。为此，他写下了十多万字的《新民说》一书，系统阐述了他对国家、权利、自由、进步等问题的看法。梁启超认为，当今是民族主义最发达的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他还公开说：“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这些思想和他以前的政治主张相比，有了不少进步，只要再往前跨一步，他就可以像不少改良主义者那样，进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行列了。可惜，梁启超没有跨出这

一步，他继续和康有为合作，组织保皇会，并奔走于日本、美洲各地，发展保皇势力，图谋使光绪皇帝重新登台，来推行他们的新政。

在日本，梁启超和孙中山有过多次接触，但当孙中山和他商定联合的时候，他又犹豫不定。他一面和孙中山谈革命，谈民族主义，计划联合后由孙中山任会长，他任副会长；一面却又听从康有为的命令，到檀香山去发展保皇会会员。他动身前还和孙中山约定合作，可是到檀香山后，却拿着孙中山的信，去扩展保皇势力，还说什么“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梁启超的这一主张，极大地迷惑了一部分革命青年。

为了划清革命和改良的界线，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东京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报》，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民报》主编章太炎的文章，尖锐犀利，把改良主义思想驳得体无完肤。《新民丛报》逐渐失去群众，销路一天天减少，终于在1907年被迫停刊。

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在政治上坚持改良主义立场，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但他在这段时间里，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论著，教育了一代青年。他以浅近、顺畅的文字，介绍和宣传了西方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的学说，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培根、笛卡儿、康德；从孟德斯鸠到达尔文；从古希腊、马其顿到近代的意大利、匈牙利，他都一一予以介绍。这些大量的新鲜知识，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被清政府通缉了十多年而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终于在1912年10月回到了祖国，但这时已没有皇帝可保了。袁世凯上台后，梁启超投靠了他，1913年组织进步党，反对国民党。同年10月，梁启超出任袁世凯当总统的司法总长。戊戌变法就是因袁世凯的出卖而流产的，但这是的梁启超已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不过，他坚决反对帝制，当袁世凯称帝时，他便策动他的学生蔡锷到云南组织护国军，开展反袁斗争。以后又参与讨伐张勋拥清帝复辟的斗争。1917年底，自觉只能做“理论的政务家”，不能胜任“实行的政治家”之职，因而退出政界，结束了前期显赫而并不成功的政治生涯。

1918年底，梁启超出游欧洲，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游遍了英、法、德、意、荷兰、瑞士、比利时等国，参观工厂、农村，访问著名学者，通过对资本主义发祥地的考察，寻求中国的出路。结果，他看到了西方“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可是，“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

来许多灾难”。他对西方文明的信仰开始动摇。回国以后，增强了以中国文化救世界的信心，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上，虽然仍不免就时事发表意见，却谨守社会名流的身份，取独立超脱的姿态，倡导国民运动，抨击时弊恶行。他对新文化运动并不抵触，改用白话文写作，又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并热心到各地进行学术演讲。晚年，除在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兼课外，主要执教于清华学校，为该校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撰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他在史学界有巨大的影响，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开山祖，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总量约在一千万字以上，是我国“古来著述最多的一个学者”。值此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方过之际，我们将 148 卷的《饮冰室合集》重行编纂，加新式标点，并搜罗了他的书信，一并出版，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张品兴

1999 年 7 月

总 目 录

- 第一卷 变法通议 (1)
- 第二卷 瓜分危言 (257)
- ✓第三卷 新民说 (555)
- 第四卷 新大陆游记 (879)
- √第五卷 开明专制论 (1229)
- 第六卷 王荆公 (1551)
- √第七卷 中国国会制度私议 (1904)
- ⊙第八卷 新中国建设问题 (2209)
- 第九卷 伤心之言 (2534)
- 第十卷 欧游心影录 (2833)
- 第十一卷 墨子学案 (3121)
- 第十二卷 先秦政治思想史 (3417)
- 第十三卷 翻译文学与佛典 (3713)
- 第十四卷 中国历史研究法 (4003)
- 第十五卷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4337)
- 第十六卷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4611)
- 第十七卷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4881)
- 第十八卷 诗话、诗词集 (5189)
- 第十九卷 戏剧小说集 (5493)
- 第二十卷 社交书信 (5909)
- 第二十一卷 家书 (6095)